

《灵智》中的疾病隐喻

刘思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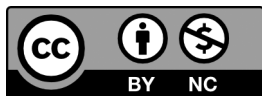
摘要 | 美国当代女性剧作家玛格丽特·埃德森凭借戏剧《灵智》荣获 1999 年普利策戏剧奖。该剧讲述了一位英国文学教授薇薇安因患晚期癌症踏入现代临床医学研究的舞台，在八个周期的全剂量治疗过程中审视自我，并最终走向死亡与重生的故事。埃德森借该剧不仅挑战了经典的生死或身心二元论范式，更是从文化建构主义角度关照了美国 20 世纪中后期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对戏剧中癌症的隐喻进行详细阐释有助于考察作品揭露的文化缺陷、道德败坏与权力僭越等社会现实。

关键词 | 《灵智》；玛格丽特·埃德森；疾病隐喻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灵智》作为美国戏剧史上少有的以医学人文为主题的作品，研究者们对其医学伦理、医患关系、灵与肉，以及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二元对立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对《灵智》戏剧主题的探索也没有脱离医学实践。细读这部作品可知，这是一部关于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戏剧。诚如埃德森所言：“这部戏剧不是讲医生如何行医，甚至也不在讲癌症如何治疗。这是一个有关善意之举的故事，但却流露出狂妄自大。这是一个有关恻隐之心的故事，但它

同时又显得麻木不仁。”^[1] 这部戏剧的主角不是医生，不是文学教授，甚至也不是疾病本身，而是疾病被赋予的意义。正是这些被附加在疾病之上的意义，造成了戏中人身份、认知、情感等一系列的改变。

《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2003）是美国著名作家及文学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 1933—2004）的理论著作。在

[1] Elaine Justice, Comment on “Author of ‘Wit’ to Speak”, *Emory News Center*, 13 March 2014, 此处译为叶露琪。文中外文文献除特别注明外，均为笔者自译。

这部著作中，桑塔格主要以结核病、癌症、艾滋病这三种疾病为例，从疾病的词源与命名入手，以现代思维的方式审视从古至今疾病背后被赋予的内涵以及隐喻性的思考方式。在当代西方文学批评中，桑塔格首次将“疾病隐喻”这个属于文化研究中的小叙事纳入文学批评的视野，即使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认为桑塔格的著述只是一种乌托邦的思考，缺乏应有的科学性 with 系统性^[1]，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著作从理论上触及、剖析了围绕在疾病之上的谜团与神话，展现了桑塔格女士对患病个体的人文关怀与人道主义精神。在《灵智》这部戏剧中，埃德森以薇薇安的视角，再现了癌症晚期患者的生命体验，本文就此视角切入埃德森的作品《灵智》，对其戏剧中癌症的隐喻进行详细阐释，挖掘其附魅于癌症之上的文化、道德与政治内涵。

一、癌症的文化隐喻

任何事物进入人类话语都会被赋予某种文化意义。当疾病作为一种文化客体，进入文学创作与批评的领域，它就不再只是生理学意义上的病状本身，而具有了特殊的文化内涵。疾病作为一种野蛮的存在，在现代话语体系中，成为人类文明社会里“健康”的对立面，甚至是“死亡”的同义语。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隐喻是“以他物之名名此物”^[2]，主要强调他物（“词”）与此物（“物”）的相似性。在这一过程中，隐喻性的思维方式应运而生，“物”在不断被隐喻和被阐释的过程中被替代而不复存在，“词”与“物”分离，如同现象与本质的分离，最终现象代替本质，本质/此物被其隐喻所遮蔽。如此看来，隐喻实际上不可避免，但桑塔格认为，“当然，没有隐喻，一个人就不可能进行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一些我们宁可避而不用或者试图废置的隐喻。”^[3]疾病便是其

一，即使人类在认知过程中无法摆脱语言的偏离，这些被隐喻遮蔽的事实的本真也理应被揭示出来。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女性戏剧创作蓬勃发展，在这二十年间，美国共有五位女剧作家问鼎普利策奖，而玛格丽特·埃德森则是20世纪最后一位获奖的女性剧作家。埃德森的作品不仅展现当时女性剧作家共有的聚焦题材，并在吸收和采纳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使创作主题更加成熟与丰富、视野更加开阔，戏剧风格与表现手法也在发生变化并突破传统。《灵智》中薇薇安所患的卵巢癌具有鲜明的文化性别指征，卵巢是产生卵子、孕育生命的器官，卵巢癌属于女性生殖器官的癌变。如果癌被认为是一个“有自己意志的胎状物”^[4]，那么卵巢癌对不婚不育的薇薇安来说则意味着变相的惩罚，甚至是一种恶魔般的妊娠，以及孕育死亡的存在。但埃德森并没有局限于女性的身份或自我困境的强调中，而是超越了女性主题，通过审视疾病与死亡——这个人人都正在经历或终将经历的共性象征，警示现代文明社会下工具理性的诞生与人道主义的泯灭。这样一个高度已经远远跨越了性别或者是地域的界限而将人文关怀的温暖辐射到整个人类，同时也是对美国戏剧家庭关系传统主题的革新。

不仅如此，埃德森还受到20世纪末期美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发展的影响。20世纪中后期，许多现实主义作家吸收了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

[1] 王予霞：《疾病现象的文化阐释》，《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年第6期。

[2] Aristotle, *Poetics: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3.

[3]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83页。

[4]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13页。

的艺术技巧，形成一种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又与现代主义有区别的“新现实主义”^[1]。传统现实主义旨在追求真实，再现现实世界，反映社会生活。埃德森继承了美国戏剧传统的现实主义创作基调，但在艺术技巧方面采用了贝尔托·布莱希特的间离方法，让薇薇安时常跳出角色与观众直接进行对话，不断挑起观众的主观能动性。本应会使观众沉浸其中的剧情变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如此一来，便会促使观众进行多角度的理性思考与反思。这种表现形式本质上产生的是一种陌生化，或者说疏离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也同样应用于这部戏剧的语言文字中，例如薇薇安与她的主治医师柯里奇安分别是人文学科领域与自然科学领域的权威，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习惯利用陌生的专业术语来阻碍对话，抑制交流，以此获得场域内的主导权和控制权。

除此之外，埃德森还受到欧洲荒诞派戏剧与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对语言中意义断裂的本质洞察极为深刻。剧中苏茜为薇薇安注射吗啡后，薇薇安觉得吗啡会让她“嗜睡（soporific）”，苏茜文化程度不高，她表示自己不知道薇薇安说的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她认为吗啡会“让你犯困（makes you sleepy）”^[2]。薇薇安告诉她这两个词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后，两人大笑不止，直到“薇薇安的笑声变成了一声长长的叹息”^[3]。此时此刻薇薇安终于察觉自己荒芜的孤岛般的精神世界，以及终生被困于语言牢房中的荒诞人生。埃德森用这种黑色幽默的方式揭示了薇薇安的孤独本质，并借此引发读者自主的精神困惑与反思。

薇薇安与柯里奇安的相似性也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黑色幽默。薇薇安一生都在使用这些高级词汇或者专业术语来排斥他人，阻断交流，试图把自己与他人隔绝开。而柯里奇安使用同样的逻辑，将薇薇安排斥在对话之外，使薇薇安感受

到文化权力的压迫。柯里奇安如同过去的薇薇安一样理性、执着、冷漠，喜欢挑战困难，有着崇高的学术追求，忽略艺术与人性价值。所以他会为了自己的临床试验选择性无视患者的痛苦，在治疗过程中不断选择更适合治疗“疾病”而不是“患者”的研究方案，并且从未将薇薇安视为生命主体考虑她的想法。这种宿命般的巧合，使薇薇安无法摆脱的主体消亡的悲剧命运更具强烈的哲理反思意味，埃德森借此展现了其更深层的人文关怀，让读者更为深层次地感受到悲惨、无奈的情感。

二、癌症的道德隐喻

埃德森出生于1961年，母亲是一位医疗社工，父亲是报社的一名专栏作家。1983年，埃德森在史密斯学院获得文艺复兴历史学士学位。1985年，她成为马里兰州贝塞斯达国家癌症研究所的一名职员工作，在那里，埃德森见证了卵巢癌与艾滋病治疗方案的研发，最终于1991年创作出《灵智》。

在这部戏剧中，薇薇安事业有成，但人到中年依然过着茕茕孑立的生活，她未曾结婚，父母皆逝，没有亲人。于是，卵巢癌常被归结于是对薇薇安特立独行生活方式的惩罚，这实则是一种误读，卵巢癌并非对薇薇安“不婚不育”主张的惩罚，而是因20世纪中后期生育率降低间接导致的客观现象。据美国癌症协会统计，在美国，卵巢癌整体发病率从1985年（16.6/10万）至2014年（11.8/10万），下降29%，死亡率

[1] 马工程外国文学史编写组：《外国文学史（第二版）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第161页。

[2] Margaret Edson, *W;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73.

[3] Margaret Edson, *W;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74.

从1976年（10.0/10万）至2015年（6.7/10万），下降33%^[1]。通过这组数据可以推测埃德森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的那一年，也就是1985年，正是美国卵巢癌整体发病率的高峰时期。埃德森在国家癌症研究所工作一年，接触到了许多癌症患者及家人，她对卵巢癌的低生存率感到震惊，并对患者在面对死亡以及重压时所展现的优雅与勇敢感到敬畏，因此创作出《灵智》这部戏剧。埃德森在创作完《灵智》后，并没有创作下一部戏剧的打算，在1999年的采访时，她说：“我想写这部剧。《灵智》就是我想写的剧。我现在是一名老师。如果十年后我还有什么想说的话，我会考虑创作下一部，但我对离开教学岗位去从事其他工作不感兴趣。”^[2]

虽然卵巢癌的患病原因目前主要与遗传有关，但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多次分娩可降低患癌风险。“生殖激素水平可以直接在卵巢上皮细胞中具有强大的生物学效应，从而影响卵巢癌的发生。孕激素介导细胞凋亡的影响可能是卵巢癌的保护性因素，所以口服避孕药和怀孕（高孕激素状态）可降低卵巢癌发生的风险”^[3]。但如果观察20世纪中后期世界生育率就会发现，“1960年至1974年的十年间，加拿大总的生育率从3.9降至1.9，而美国同期生育率则从3.7降至1.8”^[4]。因此便不难解释20世纪中后期卵巢癌的高峰发病率。而20世纪中后期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可以说与60年代女性主义的第二次浪潮息息

相关。薇薇安的生活方式明显受到第二次女权运动时期激进派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流派认为爱情只能给女性带来脆弱无能、过度依赖。受到第二次女权运动的影响，美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显著，但女性追求高等教育并不是为了组建家庭，而为事业做准备，大部分女大学生认为家庭生活与事业是互不相容的。^[5]不仅如此，在当时，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融合，还需要挑战的便是教育领域内存在的性别歧视和父权制知识霸权。薇薇安为了工作呕心沥血，然而她却提到如果自己死去，同事们（其中大部分是薇薇安以前的学生）“会疯狂地争夺我的职位”^[6]。这部“新现实主义”代表戏剧不仅反映了那个年代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也真实再现了社会中毫无人情味的冷漠的道德规范。

《灵智》的海报上，剧名多次被写作W; t而不是Wit，分号代替了代表“自我”的字母i，象征着“一种阻隔”或者“一道鸿沟”^[7]，隔离的则是寓意智慧的“W”（Wisdom）和技术的“T”（Technology）^[8]，意指人文与科学的断裂。不仅如此，分号同时也是一个被压弯的“i”（自我），这种弯曲提示着该剧主人公薇薇安因患癌症而在道德评判的重压下逐渐扭曲的自我认知。

根据有关癌症的神话来看，癌症通常是情感持续压抑的产物。薇薇安与她的父亲一样，从小就不喜欢“无意义的交流”，所以她研究语言的

[1] 《2018最新卵巢癌统计数据公布》，《中国肿瘤临床与康复》2019年第2期。

[2] Edson. Margaret, "Interview with Jim Lehrer," *Online News Hour*, April 14 1999.

[3] Hoekstra A. Rodriguez GC, *Chemoprevention of ovarian cancer* (Cancer Treat Res, 2009), pp. 3-34.

[4] 肖君华：《不婚不育：一种后现代生育现象的伦理评析》，《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5] 巩凡：《美国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20世纪60—80年代）》，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师范大学，2011，第40-41页。

[6] Margaret Edson, *W; 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32.

[7] 朱黎航：《知识·人性·伦理——评玛格丽特·埃德森的戏剧〈才智〉》，《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1期。

[8] 李晶：《身体的舞台呈现与戏剧共情——论玛格丽特·埃德森剧作〈灵智〉》，《戏剧艺术》2022年第2期。

意义，一心热爱科研，压抑情感、追求理性。随着帷幕拉开，薇薇安将自己的过去娓娓道来，观众不再会询问“为什么薇薇安会得癌症”这样的问题，因为人们总是坚信那种“不懂感情、克制和压抑的人”会更加容易患上癌症。^[1]但这里存在着一个问题，薇薇安的自述或者回忆一定真实客观吗？戏剧伊始就提示观众，接下来的剧情是薇薇安临死前不到两个小时的自述，那她的记忆是否会受到疾病以及治疗副作用的影响？薇薇安与其说是在回忆过去，更是在请求原谅。因为当癌症这一意象附加了惩罚性质，癌症就变成了一种自我审判的形式，大多数患者一旦患上癌症，就感觉自己在道德上低人一等。但桑塔格认为，“这种荒谬而又危险的观点试图把患病的责任归之于患者本人”^[2]。

人们总是将癌症患者视为生活的失败者，而薇薇安也认为卵巢癌是自己造成的结果，不仅事实并非如此，这也透露出人们对疾病的生理方面的贫乏的理解。剧中薇薇安的每一次回忆都是在遭受治疗的痛苦后，对自己过去所行之事的一种忏悔，继而镜头一转回到医院，这样的表现手法恰到好处牵动着观众的情绪，让观众认为薇薇安如今所受的非人待遇是一种自食恶果的报应。但如果单独审视薇薇安过去所行之事，就会发现她实际上“罪不至此”。实际上，薇薇安的情感回避除了自身个人意志的选择，更多的是被社会道德环境所影响和塑造。在20世纪，在那个女性正在奋力争取工作机会和社会地位的年代，在那个工具理性成为神话、人们崇尚效率至上的年代，薇薇安作为一位严肃古板、未婚未育的文学教授，的确受时代影响，过度追求理性，试图用自然科学崇尚的理性逻辑阐释文学作品，但她也不应该因此被学生嘲笑，被同事排挤，甚至被社会道德贬低为刻薄冷漠、冷血无情的人。薇薇安正是患上癌症住院治疗，因自己与柯里奇安

同样“理性至上”的价值观，才开始将外界对自己的种种评价扭曲内化为对自我的认知，并将患病的责任归之于自己身上，以此缓解治疗所受痛苦。

在文学作品中，身心的疾病在作者笔下往往不是一种单纯的生理现象，而是常被隐喻为社会的病态。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薇薇安身上存在着一些美国传统的清教徒精神，她学生时期勤奋好学，认真刻苦，从不耽于玩乐，毕业后成为大学教授，依然十年如一日洁身自好，一心追求事业，拥有排除万难的非凡勇气和决心，但在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中，这样的优秀品质不仅没有受到社会道德层面的称赞，反而被曲解为间接导致癌症的问题所在。正是因为她成长时期与社会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与性格特点，使得她只能常年与诗歌为伴，并在面对痛苦与死亡时不断重复玄学派诗人邓恩的诗歌，以此强化自己的意识并获得勇气。在薇薇安的回忆中，在她临死前，E.M.阿什福德教授看望她时，埃德森借老教授之口说“无论你在哪儿，上帝总会找到你”^[3]。正是因为埃德森对基督教的信仰^[4]，以及薇薇安身上具备的清教徒精神，所以埃德森最终选择用“上帝”救赎薇薇安的灵魂，以神学思想消解一切矛盾与精神困惑，以《圣经》这一西方道德思想的来源警示人们现实世界因工具理性所导致的道德沦丧与思考力的丧失。

但埃德森在剧本中将这段情节表现得十分玄

[1]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37页。

[2]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43页。

[3] Margaret Edson, *Wit*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80.

[4] Martha Greene Eads, "Unwitting Redemption in Margaret Edson's *Wit*," *Christianity and Literature* 51, no. 2 (2002): 241.

妙。阿什福德教授到达医院之前，薇薇安已经被病痛折磨得神志不清，并注射了吗啡昏睡过去。老教授临走时对薇薇安说：“该走了，成群的天使为你歌唱，直至你安息。”^[1]“该走了”既能指代阿什福德教授的离开，也意味着薇薇安的死亡，老教授就是那个来为薇薇安歌唱的“天使”，而老教授的来访实际上是薇薇安临死前回光返照做的一场梦，如同卖火柴的小女孩在生前最后一刻看到的美好愿景，此后直到戏剧结束，薇薇安都无法再言说一词。

20世纪下半期，科学技术空前发展，人类所取得的物质财富远超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社会问题，埃德森通过剧名与疾病隐喻展现薇薇安压迫之下扭曲的自我，借此关照现实世界人性道德的泯灭，并对“理性”提出质疑。

三、癌症的政治隐喻

除了文化和道德的隐喻，疾病的政治色彩是成就这部戏剧的关键因素之一。埃德森通过学校到医院权力场域的变换、薇薇安从权力主体沦为客体的现象，揭露了现代医学对生命个体的政治性治理与规训，以及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再现了权力对生命的僭越现实，对知识与权力交接的学术界有着极深的启发意义。

《灵智》主要在学校和医院两个场域展开叙事。薇薇安的生命权力主要由两个方面来体现：语言与身体。语言是生命权力实施的一项重要途径。以柯里奇安和杰森为代表的医疗工作者们均使用大量的专业术语，并以此拒绝患者参与对话。这种语言是完全封闭的，仅仅用于传达某种决断、宣判和命令，无法进行证明和解释^[2]。薇薇安在接受治疗后，学习大量医学词汇，试图获得尊重与认可，重新拥有对自己生命的话语权，但这种方法行不通的。当薇薇安接受治

疗，进入临床医学场域内，就意味着权力话语关系已经发生了转变。他们在薇薇安床边宣读着一项项数据，不在乎薇薇安是否能听懂，因为在他们眼里并没有薇薇安这个人，只有薇薇安的卵巢这个研究对象与其提供的研究数据——研究对象不会说话，所以他们与患者的交流更像是一种单方面的通知而不是对话。

戏剧伊始，柯里奇安用“为知识做贡献”说服了薇薇安接受全剂量治疗方案^[3]。这里的“知识”实际上就是现代社会建立的现代科学，正如威尔金所指出在福柯和其他社会建构主义者那里，“知识”这一概念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意义，“‘知识’不是天生形成的，而是通过在宏观和微观层面构建社会主体的话语实践而被彻底历史化并传递给我们的。”^[4]当现代科学成为人们认知事物主流的，甚至是权威的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就会沦为工具理性，人就丧失了自我反思的能力。临床医学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与权力结合，成为统治人们生命的力量。这种医学范式的思维模式导致的结果便是患者成为研究客体，人成为被遗忘的存在。过去的薇薇安与柯里奇安都崇拜知识的至高性，从而忽略了人性与尊严。正因如此，柯里奇安才会一心扑在临床医学试验中，而忽视研究对象——患者本身的情感需求，薇薇安才会牺牲个人利益，臣服于知识霸权之下忍受治疗的苦难与痛楚。

除了语言，埃德森对患者身体的处理也极具

[1] Margaret Edson, *W;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80.

[2] [德]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第94页。

[3] Margaret Edson, *W;t*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4), p. 11.

[4] Peter Wilkin, “Chomsky and Foucault on Human Nature and Politics: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25, no. 2 (1999): 183.

哲理意味。薇薇安在治疗过程中毫无个人隐私与尊严可言，她不仅要忍受曾经的学生杰森为她做妇科检查的屈辱和尴尬，还要将身体展露出来，被一群年轻的实习医生公开审视和讨论。如果没有苏茜，薇薇安也许连临终意愿都无法得到保障。“社会对个体的控制不仅是通过意识或意识形态来完成的，而且这也可以在身体之中以及用身体来实现社会的控制。身体是生命政治的现实；医学是生命政治的策略。”^[1]薇薇安从研究的主体变成被研究的医学客体，不仅仅只是身份的转变，更代表着人权的主体随时都可能会变成赤裸生命的现实。

再则，该剧通过现代疾病的隐喻显示出个体与社会之间一种深刻的失调，社会被看作是个体对立面。薇薇安被转移至隔离室时说，并不是她所患的疾病让她被隔绝，而是治疗让她被隔绝。20世纪末期，临床医学实验对癌症的治疗方案考虑到了一切，却唯独没有考虑患者的身体。只要能拯救患者的生命，对身体的几乎任何损害都被认为是正当的。^[2]薇薇安所患的四期卵巢癌治愈率极低，可以说从一开始就宣告了薇薇安的死亡，而卵巢癌的症状也并不明显，所以薇薇安所遭受的一切痛苦实际上都是治疗带来的。杰森甚至不顾薇薇安的临终意愿，强行对她实施抢救。最终被苏茜强行阻拦后大喊“我弄错了”。杰森的错误不仅仅在于他实施了全力抢救，更在于他忘记了薇薇安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并不是他

的研究数据。埃德森借此提出对临床医学中“过度医疗”的质疑：极端理性的临床医学看似是为了追求真理、保障社会利益与扶植生命，实则具有压迫性与否定性的力量，以此强制介入生命管理，并在这个过程中违背医疗规范与医学伦理，忽略个体承受的不可承受之痛，抛弃人文关怀。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孰轻孰重，科学真理与人文伦理又该如何平衡？埃德森在戏剧中已经给出了回答，科学需要立足于敬畏生命和伦理，否则科学与迷信、邪教别无二致。

疾病隐喻的不可避免并不意味着放弃对疾病隐喻的批判。它不仅反映了社会文化的巨大缺陷，也会扭曲患者对疾病的态度，对治疗造成严重影响。诚然文学作品中的疾病从来都不只是生理意义上的疾病本身，而是关乎社会现实，与个体生理、心理，以及社会的状态融为一体，而与时代息息相关的戏剧尤其如此。《灵智》是美国戏剧史上少有的揭露医疗话语体系的戏剧，这部作品使大众对疾病与社会、疾病与个人的互相塑造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为疾病叙事在美国戏剧中的发展，以及医学人文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刘思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

[1] [法] 米歇尔·福柯：《认知的意识》，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第137页。

[2]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第60页。